

一代儒商與文豪的交往



蔣抑卮 與 魯迅

▲一九〇九年，蔣抑卮（右）在日本東京治病期間，與魯迅（左）、許壽裳合影



▲「第七九號」《魯迅全集》（紀念本）



▲一九〇九年，蔣抑卮（左四）與其妻孔繼尊（左三）、魯迅（左二）、許壽裳（左六）等人，攝於日本東京



▲一九〇九年，蔣抑卮躺在醫院病榻，與許壽裳（左一）、孔繼尊（左三）、魯迅（右一）等合影於日本東京

蔣抑卮與魯迅的交往，早見於建國初期影印出版的《魯迅日記》，及周作人的三本回憶著作，卻一直未受到學術界注意。直到一九七六年，魯迅仙逝四十年後，才引起研究者廣泛討論。

魯迅仙逝四十年後，即一九〇四年舊曆八月二十九日（西曆十月八日），魯迅致蔣抑卮函，談論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習情況，抒發思鄉與愛國情懷，以及他們之間真摯友誼。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一封魯迅書信，也是研究魯迅早年思想追求的重要文獻。

赴日留學建友情

蔣抑卮，本名鴻林，諱名玉林，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七日生於杭州。其父蔣海壽，名廷桂，是杭城絲綢大王。蔣家於一八五八年，在杭州積善坊巷，開設蔣廣昌綢莊，由於經營有方，聲譽漸起。一八七六年，又在上海開設廣昌隆綢莊，之後，業務擴展到全國各地，乃至東南亞，帶，產銷兩旺，獲利豐厚，成為遠近聞名的杭州巨富。

蔣海壽長子蔣玉泉隨父經商，無暇入學。蔣抑卮作為次子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私塾念書成績頗佳，其父喜不自勝，為他取名「一枝」。意思是說，蔣家世代經商，唯有他「一枝獨秀」，可以舞文弄墨。誰知長大成人後，他卻十分厭惡科舉八股，不喜歡沾染官場習氣，反而潛心於古文字研究，曾求教於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。

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，西方列強侵凌中國，蔣抑卮懷著「師夷之長技以救國」的熱忱，毅然離家別子，東渡日本留學，打算進入東京武備學堂。

據一九〇三年春《浙江潮》第三期刊載《浙江同鄉留學東京題名》，註明「癸卯三月調查」，記載：（光緒）二十八年九月（到東京），自費，預備入校。又據《清國留學生會館報告》記載：一九〇二年十一月，蔣抑卮與周樹人、許壽裳等浙江籍留學生，及僑居、遊學於日本東京者一百多人共同組成浙江同鄉會，並商議出版《浙江潮》。

周樹人，幼名樟壽，字豫才，紹興人。一九〇二年三月因學業成績優異，被浙江總督派往日本留學，進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文。《魯迅》是他於一九一八年，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《狂人日記》使用的筆名。許壽裳，字季弗，號上遂，紹興人。一九〇二年獲得浙江官費資助，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文，後轉入東京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就讀。

在他的主持下，《浙江潮》發展成為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之一。

《浙江潮》創刊伊始，資金短缺，蔣抑卮捐款一百元作為開辦費。魯迅為刊物撰稿，許壽裳任主編。以此為契機，三人往來日益頻繁，友誼逐漸深厚。蔣抑卮初願是進入城陸軍預備學堂，但當時日本文部省規定，自費生不得學軍事。他也考慮到，自己身體比較羸弱，乃改學經濟。

一九〇四年四月，魯迅在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畢業。六月一日，魯迅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之前，在東京填寫《入學志願書》及《學業履歷書》（原件現存日本），自署「周樹人」簽名之下，均鈐印「抑卮」兩字腰圓形印章。據查證，這枚印信是蔣抑卮終年隨身攜帶之物，從事銀行、商務活動，涉及文書、款項往來，均用此章。魯迅與蔣抑卮當年交往甚厚，相互了解信任，由此可窺一斑。

魯迅《仙台書簡》

一九〇四年夏，蔣抑卮因耳疾復發，由夫人孔繼尊陪同在仙台參加入學儀式。十月八日，魯迅致蔣抑卮函云：「前曾由江戶（即東京）奉一書，想經察入，爾來索居仙台，又復匪耳。」及「所聊慰情者，僅我舊友之筆音耳」，結尾又點出「秋氣蕭蕭，至祈攝衛，倘有餘音，乞時賜教言」，表達對好友的思念，情感質樸真摯，如同別後重逢，促膝傾談。

魯迅還就《黑奴籲天錄》讀後傾吐感想：「曼思故國，來日方長，載悲黑奴，前車如是，彌益感觸。」又談起與日本青年接觸後的感想：「近數日間，深入彼學生社會間，略一相度，敢決言其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，……以樂觀的思之，黃帝之靈或當不饒歎！」字裡行間充滿對祖國的熱切之忱，燃燒着熾熱的愛國情思。

當時，來訪日本同學雖不在少數，由於受軍國主義影響，不少人趾高氣揚。魯迅諷刺他們為「阿利安人」，「懶與馴對」。魯迅對老師藤野嚴九郎十分敬重，學業孜孜以求，但總認為「校中功課，只求記憶，不須思索，修習未久，腦力頓竭，四年而後，恐如木偶人矣。」兩年後，魯迅棄醫從文，這封信已見端倪。

魯迅早年留居日本七年，往來書信至今只發現這一封，彌足珍貴。蔣抑卮年長魯迅六歲，魯迅在信中稱其為「長兄大人」，提及「推往納學費，則拒不受，彼既不收，我亦不遜。至晚即化為時計，入我懷中，計亦良得也。」據此可知，魯迅在仙台醫學專就讀期間，學費得到蔣抑卮資助。

在推脫不了的情況下，魯迅用這筆錢買了一隻懷表。蔣抑卮回國後，適逢以湯壽潛為首的浙江鄉紳，反對清政府向英商借款修築蘇杭甬鐵路事。一九〇五年七月浙江鐵路公司成立，湯壽潛任總理，鼓勵商民集資，招得兩千三百萬元實收股金。蔣抑卮向湯壽潛建議開辦銀行，一九〇七年十月，浙江興業銀行在杭州正式成立營業，是為中國第一家商辦銀行。作為最大股東蔣家的代表，蔣抑卮出任常務董事達三十餘年之久，成為掌握銀行實權者之一。

魯迅仙台學醫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：「我的夢很苦澀，預備畢業回來，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……誰知兩年後，一九〇六年初，他在電影中看到，日俄戰爭期間，日本軍人刀斬中國人，圍觀者卻是神情麻木的同胞，使他徹底打破醫學夢想，認為「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，還應該有較廣大的運動：先提倡新文藝，以喚起人們覺悟。魯迅毅然放棄學業來到東京，着手創辦《新華》雜誌。」

一九〇九年初，蔣抑卮耳疾復發，由夫人孔繼尊陪同赴日本東京就醫。這期間，魯迅與許壽裳一起去醫院探望，留下三張珍貴照片。其中，醫院病榻前的一張，原照是貼在印有「東京神田」、「江木」照像館字樣的硬卡上。一九七六年元月，蔣抑卮哲嗣蔣顯輝專程赴北京，將《仙台書簡》原件隨同三幅照片面交周海嬰，今收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。

出版《域外小說集》

起先，蔣抑卮與夫人孔繼尊，擠住在魯迅、許壽裳等人寓所中，即東京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號。後來，許壽裳在西片町十號找到一處新居，蔣氏夫婦才搬過去。

周作人在《知堂回憶錄·蔣抑卮》一文中，有詳細追憶：「蔣抑卮，名曰鴻林，本身是個秀才，很讀些古書以及講時務的新書，思想很開通……白天裡由他夫人同下女看家，他自便到這邊來談天，因為人類通達，所以魯迅很談得來，我那時只是在旁聽着罷了。這一聽譯印小說的話，就大為贊成，願意墊出學費來，助成這件事，於是《域外小說集》的計劃便驟然於幾日中決定了。」

周作人在《魯迅的故家·袁文獻與蔣抑卮》一文中，也提到蔣抑卮具體出資情況：「他知道魯迅有介紹外國小說的意思，願意幫忙，墊付印刷費，實了後再行還他。這結果便是那兩冊有名的《域外小說集》，第一冊一千本，墊了一百元，第二冊減少印了五百冊，又借了五十元，

假如沒有這墊款，那小說集是不會得出版的。」一九〇九年舊曆正月，《域外小說集》第一冊出版；舊曆六月，又出版第二冊。兩冊共收小說十六篇，魯迅翻譯安特來夫的《漫》、《默》，迦爾海的《四日》，這三篇俄國作品；其餘十三篇是周作人翻譯。《序言》、《略例》均出自魯迅手筆。

《序言》云：「《域外小說集》為書，詞致樸訥，不異方近世名人譯本。特收錄至審慎，遂譯亦期弗失文情。異域文術新宗，自此始入華土。使有士卓特，不為俗俗所囿，必將掣然有當於心，按邦國時期，擅讀其心聲，以相度神思之所在，則此雖大濤之微瀾與。而性解思惟，實寓於此。中國譯界，亦由是無運莫之感矣。」短短幾句話，可以看出青年魯迅的抱負。這種切切實實，不自矜、不自餒的精神，正是魯迅一生所堅決奉行的。

周作人在《袁文獻與蔣抑卮》文中提到：「此書在東京的群益書社寄售，上海總經理處是家網緞莊，很是別致，其實說明瞭也極平常，因為這舖子就是蔣家所開的……民國以後，魯迅在北京的時候，蔣抑卮北來必去拜訪，可見他們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。」至於這兩本集子最後的命運，除賣出一小部分，送人一部分，其餘都存放在杭州蔣廣昌綢莊，及蔣抑卮在上海範圍的凡將草堂藏書樓。算得上是軼事一樁了。

當年夏，蔣抑卮痊愈回國，寓居上海。不久，魯迅、許壽裳也一起回國，二人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，後又供職於國內多家知名學府。許壽裳曾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，一生著述頗豐。

魯迅歸國以後，與蔣抑卮往來仍頻。《魯迅日記》總共寫下與蔣抑卮有關的往來資訊，有四十二處之多。一九二二年春，魯迅受蔡元培邀請赴南京教育部任職，四月遷北京。《魯迅日記》正是從這一年的五月五日開始記事，是年九月十四、二十九日兩則日記，寫下了「蔣抑卮來」。當時，蔣抑卮在北京籌備開設「浙興」分行，往來於上海、北京之間日頻繁。

魯迅因「三·一八」事件被迫離京赴廈門任教。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，這十餘年間，《魯迅日記》寫下蔣抑卮在北京往還資訊達三十九條。尤其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，記下「夜」、「晚」、「下午」、「午後」、「上午」等不同時間，「蔣抑卮來」達十九次。

縱觀蔣抑卮與魯迅的交往，以一九二七年「四·一二」事變為界。這之前，他們以故鄉情、異國留學友誼，對文化事業的熱情為紐帶，建立長期交往。儘管以後，魯迅成為左翼文化領袖，蔣抑卮是民族資產階級代表，雙方思想漸遠，來往日疏。然而，在風雲激盪年代，蔣抑卮作為舊式知識分子，始終欽佩魯迅，保持幾十年友好交往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開明意識的人物。

（本文經蔣世承大力協助，特致謝意。）

魯迅《仙台書簡》

